

001142

刘东声
刘盛林

北京牛街

北京出版社

北京牛街

高戈



刘东声

刘盛林

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
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编

北京出版社

目 录

前 言	(1)
沿 革	(1)
经 济	(29)
政 治	(74)
宗 教 (清真寺)	(124)
教 育	(147)
医 药	(189)
民 俗	(197)
结束语	(214)

前 言

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56个兄弟民族。回族，在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族，共有721万多人，占全国总人口的0.7%强。北京市回族人口据1987年测算统计为18.5万人，占北京市人口的2.01%，而其中宣武区占的比重尤大。宣武区人口56万多人，其中回族31900人，占全区的5.7%，大部分集中居住在牛街一带。

牛街作为一条回民聚居的街道，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。尤其元、明、清以来，北京一直是中央政权所在地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，很多民族政策都从这里制定推广到全国，各地的民族关系也必然反映到北京。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牛街礼拜寺矗立在这条街道上，接纳着来自国内外的穆斯林。因此，无论研究北京史、民族史、宗教史或近代史，都离不开牛街。长期以来，研究整理牛街的历史已成为牛街有识之士迫切的愿望。还在1978年，已故的市政协委员马祝三先生就曾各处走访，搜集了不少素材。1985年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出了《关于征集与牛街地区回民有关的历史资料》的启事，并附发了征集提纲，两年多来搜集到30多万字资料，宁夏大学副教授杨明德（新民）、云南大学教授杨兆钧（涤新）、新疆文史馆王梦扬（徵言）、北京大学杨汝信（雪门）以及马敬儒、唐震宇、杨文

联、马崇义、刘树琛等老先生都撰写了重要的资料。1987年下半年起，经久居牛街的回民刘东声、刘盛林、马耀3位同志反复调查核实，由刘东声、刘盛林用8个多月的时间参考这些材料撰写了《北京牛街》一书的初稿，这就是今天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。这本书，记下了有关牛街的翔实史料，实现了广大回民的宿愿，是值得庆贺的。

本书所撰写的资料，除牛街的历史沿革外，均以辛亥革命前后为时间上限，如再往前提，就很难收集到亲身经历的资料了。时间的下限，基本上截止北京解放初期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和事，多有档案可查，知者较多，留待来日整理。当然有些事情很难以时间划线，解放后的情况也略有涉及。

由于我们接触面有限，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也都有局限性，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希望各界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今后修正补充。

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北京市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89年10月

沿 革

牛街，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西南隅，呈南北走向，北起广安门大街，南至南横西街，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街道。牛街一带是北京市最大的回民聚居区。以牛街为中轴，在它的东西两侧，有大小几十条胡同，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回族居民。牛街回民聚居区由于历史悠久，不仅在国内颇有影响，在伊斯兰教世界也是闻名的。

历史上的牛街，其地理位置正处于唐代幽州藩镇城之中。后来辽的陪都——南京，金代都城——中都，都是沿唐代幽州藩镇城拓建而成的。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载：“南城，在今城西南，唐幽州藩镇城及辽、金故都也。”《日下旧闻考》引文维简《塞北事实》：“燕山京城东壁，寺名悯忠，盖唐时幽州镇城遗址……。”采师伦书《重藏舍利记》称：“（悯忠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。”悯忠寺的位置确定下来，对于牛街的位置即可了若指掌了。牛街东距法源寺（即悯忠寺）约半里之遥，则牛街过去正处在幽州唐藩镇城的子城之中，是有文字资料可证的。

牛街，曾名柳河村、冈上、牛肉胡同、礼拜寺街。这几个名称，代表着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反映着它的历史沿革。

我们先从柳河村这一旧地名说起。作为柳河村，其前提一定是河水潺潺，绿柳掩映的所在。但是历史上的唐幽州镇城之内没

有河流经过的记载。据酈道元《水经注·灤水》载：“……又东与洗马水合，水侧城南门东注……。”灤水，又名桑干河、卢沟河、浑河，即今永定河，下游自卢沟桥下通过，洗马沟是今天的莲花河。何以知道它是莲花河呢？《水经注》引《后汉书》：“世祖（刘秀）与姚期出蓟至广阳（即今长辛店一带），欲南行，姚期与之奋战开道于洗马沟畔。”洗马沟既是刘秀等南行所要经过的河流，而这个河流又流经蓟城南门之外，所以洗马沟即今之莲花河可资证明；同时也就完全证实了唐幽州镇城内无河流通过。待到辽代，依唐藩镇城建立了陪都南京。辽统治者惯于“岁时游猎”，并无久住燕京之意，因此对这一原来的幽州镇城，并没有投入大规模的营建，只是在子城之内修建了一组宫室，以备辽主“游幸”而已。金灭辽以后，直至海陵王篡权，于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，金迁都于燕京，改燕京为中都。从此大事营建中都，城池扩大，城市中心西移，据传在今白广路西侧附近。据记载，燕京城大半入宫室，规模宏丽，极其豪华。为了建设园林的需要，把发源于城西的所谓西湖（即莲花池）的水引入城中，河流自西而东，入城后南流。从这时起，城内即今牛街一带开始有了河流。今牛街稍西，有地名吴家桥，或系当年河道支流经过的地方而得名。因为北京地名中，凡以桥命名的地方，当年都曾有水、有河流。吴家桥这个地名给牛街一带曾有过河流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。清光绪《顺天府志》在牛街条内，引宋范成大《揽辔录》：“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使金，至燕山城外燕宾馆，燕至毕，与馆伴使副并事行柳堤……入金之丰宜门（金之南门），过玉石桥，上分三道，皆以栏楯隔之，雕刻极工。中为御路，亦拦以杈子，两旁有小亭，中有碑，曰龙津桥。”这就是当年金中都城内豪华景象的写照。

元灭金，金中都守将投降献城。缘蒙古军于1211年突破南口一带天险^①到1215年之役，蒙古人由古北口入塞，先掠取中都之东的景、蓟、檀、顺以及通州等地，然后再向西进攻中都^②。当蒙古军包围中都不久，金守臣完颜承晖自杀，抹燃尽忠逃跑，中都居民开城投降^③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说明中都并未遭到兵灾的过多毁坏。况且蒙古将领石抹明安原来是金朝将领投降过去的，他们了解中都的特殊地位，而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政策。不幸的是，蒙古人进驻之后两年，即1217年，是年为成吉思汗十二年，岁在丁丑，着了一把大火，把金朝宫殿烧毁^④。这之后，金都就日益荒芜了，昔日的宫阙变成了阡陌，剩下来的只有掩映着“御河”的垂柳，这就为以后“柳河村”地名的出现，提供了可能的条件。但柳河村之名，最早也要到元大都建成之后若干年，那时南城（指金中都旧城）已完全沦为郊野，也就是柳河村被命名之时。

应该指出，自中都陷落到忽必烈称帝，其间尚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，这时的中都又改称燕京。尽管中都已成废墟，它仍然是大蒙古国所管辖下的“汉地”的首府。蒙古大汗派遣达鲁花赤（断事官）作为自己的代表，驻守在这里，以处理“汉地”的各种事务。也就是说，在金、元之际的燕京，仍是北方重镇，并不因为它的残破而减色。

牛街，又称“冈儿上”、“藁上”或“阁上”。清《顺天府志》在南燕角条下说：“南燕角，俗讹烟阁，少南曰燕藁儿，藁即角之误也。”看来冈、藁、阁，均系角字之讹音。更具体地

① 见《金史》卷十三《卫绍王纪》，《元史》卷一《太祖记》，卷一百九十《木桦黎传》，卷一百二十《札八儿火者传》。

② 见《元史》卷一百五十《石抹明安传》。

③ 见《金史》卷一百一《承晖传》、《抹燃尽忠传》，《元史·石抹明安传》。

④ 见程巨夫《旃檀佛像记》，《雪楼集》卷九。

说，这几个字的讹音，均与燕角有关。燕角在什么地方？明张爵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载：“燕角儿在广宁门、右安门内西南角。”所指的也正是牛街一带。有人明确指出：“冈儿上”当系指现在广安门内，南线阁南口以东原来一片空旷地带的共名或泛称。犹如宣武门内南闹市口以北一带被称作“坡儿上”；西山模式口村以东被称作“碑儿上”是一样的。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冈上名称的来源是合乎情理的。但也有人认为“冈上”就是指这里地势高耸，以地貌而言。牛街过去地势较高是事实，今天牛街西侧房基均高出马路不少。但今天牛街一些老人仍把《冈志》称作《藁志》，把燕角称作“烟藁”或“烟阁”，南燕角、北燕角（即今南线阁、北线阁）读音为“南阳藁”、“北阳藁”。看来这两种解释都是讲得通的。“冈上”之名，至清初仍在沿用。

刊行于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的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说：“白纸坊，五牌二十一铺，在新城广宁门、右安门西南角。”有“……牛肉胡同，大圣安寺，小圣安寺，教子胡同……。”从其地名的排列来看，“牛肉胡同”所指显系今天的牛街。而牛街一名，可能由牛肉胡同一名演绎而来。又据刊行于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的《宛署杂记》第五卷《街道》载称，在白纸坊五排二铺有礼拜寺街，老君堂街……。不知为什么，较《胡同集》刊行晚30多年的《宛署杂记》，不沿原来“牛肉胡同”旧名，而另以礼拜寺街称之。目前只能说，牛街的曾用名又多了一个“礼拜寺街”而已。

牛街之名，或开始于清初，刊行于康熙二十五年的《日下旧闻》，已有牛街地名出现。但成书时间与《日下旧闻》差不多的《冈志》，则仍沿用旧名，令人费解。还有一说，牛街曾名榴街。因为这一带曾遍植石榴（是西域人带来的种子），用以名街。

并说牛街是榴街的音转。但是遍查坊巷籍志均不见榴街之名，况且石榴自汉代就已传入中国，加以石榴在北京，由于气候的关系，不能遍植成林，只宜盆栽以供观赏。北京俗谚说：“天棚、鱼缸、石榴树”，是老北京对有钱人家的一种形容，不独是回族。故榴街一名，恐嫌牛街之名不雅，想用榴街加以雅化吧！？

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和变迁

据历史记载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，可追溯到唐永徽二年（651年）。此后即有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不断来华。唐天宝九年（750年）安史之乱起，黑衣大食^①曾派兵东来，帮助唐王朝平乱。安史之乱之后，这一支黑衣大食兵，多不愿返回，而被安置于九江地区并准许他们择配。这是第一次定居中国数量较多的西域穆斯林^②。而更多的西域商人涌入中国是在南宋。宋偏安于临安（杭州），国库开支浩繁，为了增收，乃大开海上贸易。设番掌司、市舶司，专理其事。在沿海各地对来华的西域商人，专辟居住区，称作“番坊”。坊内自成风气。当时称这些海舶商人为“番客”，他们之中有携眷者也有与中国妇女婚配定居的，其所生的子女称“土生番客”。这些“土生番客”在长时间里，子孙繁衍，人口日多。但在唐宋以前的中国政府，只认为他们是侨居中国的西域人，而番客自己也并未以中国人自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毕竟不再回去了，而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居民。日后，这些定居下来的番客，就成了回族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① 黑衣大食：即阿拉伯在阿巴斯王朝时中国对它的称谓。

② 穆斯林：阿拉伯文音译。信仰伊斯兰教者的通称。原意为“顺从者”，指顺从真主安拉的人。

蒙古人崛起，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大举西征，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、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。随着战争的转移，就有大批的波斯人、阿拉伯人和中亚细亚人被迁徙东来。人数多至数十万，其中一些年轻的军士，就被编入蒙古军的“探马赤军”^①服役。忽必烈统一中国后，建立了元王朝。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元世祖下诏，令探马赤军“随地入社，与编氓等”^②。这样一来，众多来自西域的军士，在中国各地就地落户，并与当地中国妇女成亲。由于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原因，这些人很自然地聚族而居。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使回民散处于全国各地，形成了无数聚居村镇，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的局面。

以上简单概括地叙述了回民聚族而居和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的形成。北京也和全国各地一样。北京市内回民居住的情况，也呈现为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。牛街则是“小集中”群里一个较大的回民聚居点。牛街回民的来源和这一聚居区形成的起因和年代，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文字记载，这里仅就史料所及作初步的探讨。

前面，叙述历史沿革时，曾谈到牛街的历史地理。牛街位于唐代幽州藩镇城，即辽、金故城之中。从历史记载来看，辽与回纥人往来很密切，并有与大食王联姻的记载。辽与回纥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是很多的，如在辽的上京临潢府（今内蒙巴林左旗南）南门外有回鹘^③营，即回鹘商人居住的地方，犹如南宋的番坊。但在

① 探马赤军：成吉思汗攻金时，以所属部族编为五部，名为“探马赤军”。除蒙古族外包括色目人和汉人。在战争中出力很大。探马赤军实际类似野战军的性质。

② 编氓：即编民。氓字据古训为“自彼来此之民曰氓”。就是外地流入的人民。

③ 回鹘：即回纥。唐贞元四年（788年）改回纥为回鹘，元明时称畏兀儿，即维吾尔族。

辽的南京析津府（今北京），并无回回营（即回鹘营）的记载。到了金代，金把辽的南京变成金的都城中都，金拓建了南京，使城内“大半入宫室，百姓绝少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城内，尤其是临近其“大内”的现在牛街附近，恐难有回民聚居于此。1215年金中都为蒙古军所攻占，从此北京地区发生一场新的变化。从中都被蒙古军攻陷至忽必烈称帝，这期间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，中都被改称燕京，如前所述，燕京仍是北方的政治、军事重镇。

蒙古族的统治者，在许多重要问题的处理上，乃至日常行政管理等等，多依靠色目人。色目人当中主要是来自阿拉伯、波斯、中亚细亚的回回。据记载这里曾聚居着数以万计的回回人口^①。还有人考证，牛街礼拜寺就是始建于元代的。从寺的规模也可想见当时这里的伊斯兰教徒之多，这不仅可以窥知当时人口的多寡，更可推断这一回民聚居区的形成年代。更有实物可凭的是目前牛街礼拜寺内东跨院，有两座筛海^②坟，墓石上镌刻着古语法的阿拉伯文。西边所瘞者为筛海阿哈默德·布尔塔尼，殁于至元十七年八月（1280年）；东边则是筛海阿里，殁于至元二十年十二月（1283年）。这两位筛海很可能是牛街寺的掌教，先后逝世于此。筛海墓的存在，不仅可以作为牛街寺创建年代的物证，也是牛街回民聚居区形成时间的一个旁证。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一般通例，凡有清真寺的地方，即必须当地穆斯林聚族而居。这是因为，过去的清真寺不仅仅是为教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，同时它也是聚

^① 见王恽《秋涧先生集》卷88：“今体察到本路（中都路）回回入户，自壬子年元籍，并中统四年续抄，计二千五百九十三户。”按平均每户五口人计算，人口达万余。

^② 筛海：阿拉伯语译音。指伊斯兰教中具有很高宗教学识和修养的人，也可以解释为“长者”。

居区社会活动的中心。早年清真寺的伊玛目^① 不仅掌握宗教权，在其所辖的坊^② 内，教民的婚、丧等生活问题甚至民事争端的调停处理，也都过问。这种情况，恐与伊斯兰教的教规和当年“番坊”组织有关。坊内自成系统，伊玛目就是坊内当然的首脑。正因为清真寺在聚居区内的地位如此重要，所以哪里有回民聚居，那里必定有清真寺。以同样的道理，牛街礼拜寺最可靠的始建年代是在元朝。牛街回民聚居区的形成，是在牛街礼拜寺建寺稍前的年月。至于传说中，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朝（宋太宗至道二年，即公元996年），或按当时这里政权属辽，在辽圣宗统和十四年（公元996年）的说法，将在本书清真寺章节内加以叙述。我们认为，这一说法目前没有发现较为可靠的文字佐证。在这里姑存此说，以留待今后研究。

元建大都于旧城之北。大都建成后元帝下诏，旧城居民迁移新城者，其条件是：“以贲高及居职者为先。”元朝的穆斯林确有不少人身居要职，从这规定可知凡有钱人家或在职官员，优先迁入新城，而旧城内剩下来的只有平民百姓。于是使旧城更染上一层穷苦的色彩，越加显得荒凉了。据记载，有一个时期，原中都的遗丘废墟之间，已成了杀人越货、逃役走私出没之所。元王朝为了大都本身的安全，不得不多次在旧城进行划除活动。至明

① 伊玛目：阿拉伯语音译。即清真寺内掌管教务的人。在伊斯兰教国家伊玛目与中国所说的“阿訇”没有什么区别。“阿訇”是波斯语，北京习惯汉译为“教长”。而伊玛目在中国回族中指的是清真寺的行政负责人。过去伊玛目是世袭的，子承父职，汉译为“掌教”。清真寺内伊玛目为大掌教，还有二掌教（海推布）、三掌教（穆安金），也为世袭。而阿訇则是聘请的，任期届满可以换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宗教界已取消了世袭制度，寺务由“民主管理委员会”负责。对阿訇，为取得和国外一致称谓，有时也称作伊玛目。

② 坊：市街村里的通称。旧社会回族聚居地区，按清真寺对居民区执行宗教活动的范围，称之为坊。犹天主教的“教区”。回民过去说“坊上”就是指一个地区，“坊众”即指这一地区内的回族群众。

初，这一带也仍是荒凉的郊野。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，明王朝为了首都的安全，建立了外城或称外罗城，遂使城外的西南一带，圈入城中。尽管牛街一带圈入城内，并未改变这里的郊野面貌，因明代供皇宫蔬菜的“官家菜园”都设在这一带，如官菜园、南菜园等地名沿用至今，即是很好的说明。至清初满族人刚刚进驻北京时，为了“拱卫皇居”曾驱除非满人于城外，并规定汉官除有赐第或在中枢当值者，也不得留住于内城，所以汉官们、文士们纷纷下榻于“宣南”，尽管这一带也曾有过名士们的居处，但总的来看，南城一带比其他地方还是荒芜一些。实际上，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，牛街南口外，东边有很大的乱葬岗，两边则为豆纸作坊、菜园、粪场，仍是荒凉的郊野旧貌。据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《冈志·小引》中介绍说：“明宣武门之西南，地势高耸，居教人（即回民）数十家，称曰冈儿上。居民多屠贩之流，教之仕宦者，率皆寓城内东西牌楼（东四、西四牌楼），号曰‘东西两边’。居两边者，视冈上为乡野。嘉靖年间增筑外城，则冈上为城内地。明亡，大清兵入关，驱民出城，居两边者失其所有，遂尽趋冈上。迩来时移世易，年久贫富变迁，向之茅舍零星者，今且烟火万家矣。”这百十多字，说出了自明至清牛街地区的兴衰。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其他情况，下面做些说明：

一、明时北京回民当中的富有者居“东西两边”。虽然说的是明代，却也使人联想到元代大都城内回回的居住情况。前面说过，大都建成后，曾诏示有钱有职者优先迁入新城。迁入新城的回回，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需要，仍聚族而居。他们当时落居何处，应该就是东四、西四，也就是明朝所说的“东西两边”。明代的北京城，只把大都城的北边（即自今土城至德胜门）五里割去，其南沿向南拓出二里（即自原来长安街一线向南推至今

“前三门”一线)。所谓“东西两边”，元、明两代当不会有很大变化。今天仍完好的东四清真寺和西四的锦什坊街清真寺，都在元大都城内，且两寺都有始建于元的记载，它们的位置也正合明代的“东西两边”的说法。可见明时居“两边”的回民，是元代延续下来的。尤有令人可信的是“居两边者，多仕宦之家”，这也正符合大都建成时迁入新城者以“有资居职者先”的情况。沿袭到清末民初，东四、锦什坊街的坊众乡老^①仍以任公职和有文化的人居多。从居民的职业构成和财产状况来看，也可以作为这里的回民是元代回民后裔的一个佐证。

二、《冈志》说，清兵入关后，“居两边者……尽趋冈上”，使昔日荒凉的冈上，一变而成“烟火万家”的景象。清初的北京曾把城内“分列八旗，拱卫皇居”。当时不仅回民，连汉人也一起被驱赶到外城。但为时不久，城内被赶的居民又搬了回去。《冈志》说明了这个变迁。如“康熙己卯（康熙三十八年），东城豪富金、张诸姓”对舍云善（舍，回民特有的姓氏，读如瑟）阿訇“扫榻候之”。于此可知，康熙中叶，回族有钱人家又成了内城的居民；同时处于内城之中的禄米仓和什刹海等清真寺都建于康熙初，这就更加说明，内城不仅有回民居住，而且已形成了新的聚族而居的回民网点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认为牛街回民聚居区最初形成于元代初，历元、明、清以迄于今，伴随着回回民族的发生和发展，她始终是北京回族聚族而居的最大的地区。

牛街回族人民的来源

北京自战国时已成为燕的都城蓟城，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

^① 乡老：信仰伊斯兰教虔诚、经常参加宗教活动而又热心宗教事务的人。

史。辽代在此建立了陪都，金代在此建立它的首都。元、明、清三代北京都作为全国的首都。北京从一个地区性中心，发展成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。历史上，北京地区从来就是各族人民进出往来的地方，各族人民在这里互相融合。远自秦汉时期开始，如匈奴、鲜卑、乌桓等民族曾大量涌入幽州。魏晋时鲜卑拓跋部和丁零、高车等族的涌入北京，较秦汉时尤多。唐代，由于执行了民族开放政策，北京地区涌进了更多的少数民族。以后这些众多的民族，有的被赶了出去，有的被融合于民族大家庭之中。只有回回民族，自元代大量涌入北京后，至今仍和其他民族共同生产、生活于首都。直到今天，北京回民在全市有50多个聚居区点，分布于街道、村、镇，它和全国少数民族杂散地区城市的回民来比，人口数和密度都占第一。基于回民在北京市居住时间之长，以及人数之多都超过了居住在北京的其他少数民族，可以说，称回族居民为“老北京”是当之无愧的。

牛街的回民，除元代定居下来的以外，据《冈志》载称：“今燕都之回民，多自江南、山东等省份分派来者。何也？由燕王之国，护卫军僚，多二处人故也。教人哭父曰‘我的达’，其亦山东俗也……”。《冈志》所介绍北京回民的来源，符合多年来在牛街流传着的：“祖先是随燕王扫北，揪着龙尾巴来的”的说法，即指朱棣曾封燕王，封地在今北京（当时称北平）。所谓“燕王之国”，即是朱棣就燕王封，自南京北来。如今牛街仍有所谓“门刘家”，据自称，他们来自南京水西门刘家；再如有梁姓称大顺堂梁，据说他们祖辈是燕王随军厨师，大顺堂是朱棣赐的堂号。

北京牛街的回民住户，在相互称谓上有个特点，在姓氏之前，都有一个类似汉族的“堂号”（如“三槐堂王”之类）性质的“定

语”，便于区别同一姓氏的人家。这种“定语”一般称作姓氏的“小说”。如上面所举的“门刘家”等等。这些小说，有的能说明这一住户来自何处，有的则是说明它的职业。姓氏“小说”对于考证牛街回民的来源、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《冈志》中列举了当时牛街回民的姓氏，在今天的牛街，上述姓氏有的仍可找到。

牛街回民聚居区的街巷和聚居区的疆域

牛街回民聚居区，随着它的兴衰、人口的多寡，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“疆域”。因为聚居区不同于行政区划那样有定界，要考察它的疆域就只能依据回民聚居的街巷和街巷的方位。《冈志》有《街巷》一章，它把冈上范围内的各条胡同一一列举出来，其中有的地名已不可考，有的地名尚可在旧坊巷籍志中找到。现就《冈志》所列的地名逐条加以考订和说明，这样既可弄清冈上地区清朝时与今天的四至，也可进一步了解牛街的历史和人民的来源，以及当地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宗教生活等情况。《冈志·街巷》内所列地名如下：

街 巷

东街（俗名轿子胡同）、西街（俗名牛街）、大圣安寺街、火药局、小圣安寺街、贞节坊（俗名熟肉胡同）、栅栏胡同、白纸坊、枣林街、愍忠寺街、瓦街（俗名羊肉胡同）、簪儿胡同、麻道胡同、香儿胡同、老军地、醋张儿胡同、郑家园、甄家穿店、丁